

分清科学界中的大是大非



浙江人民出版社

分清科学界中的大是大非

※

浙江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杭州武林路方石里1号

浙江省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1号

地址：杭州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浙江分店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5/8 字数135,000

1957年12月 第一版

195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70

统一书号：3103·77

定 价：(5)三角八分

目 录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郭沫若(1)
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兩条道路·····	于光远(11)

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光明日报”社論(22)
党不能领导技术嗎? ·····	“工人日报”社論(26)
斥“外行論”·····	“光明日报”社論(29)
誰說党不能领导科学? ·····	竺可楨(32)
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不能离开党的领导·····	汪旭庄(37)
党是完全能够领导科学事业的·····	茅以升(47)
党能够领导科学, 能够领导教育,	

能够领导知識分子·····	华罗庚(57)
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必須加强党的领导·····	吳 振(64)
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保护科学家·····	赵九章(74)
就亲身經历来駁斥右派分子五点謬論·····	鮑国宝(77)
右派分子是“狼”不是“外婆”·····	陆学善(85)
比較科学事业之今昔, 駁斥右派分子的胡言乱語! ·····	錢崇澍(89)
科学研究可以不要計劃嗎? ·····	秦元勛(92)
烏云遮不住太阳·····	高士其(96)
八年胜过七十年·····	王德滋(99)
明辨工程技术界的大是大非·····	“工人日报”評論員 (103)

在社会科学問題上我們和右派爭論些什么? ·····	林潤青 (108)
---------------------------	-----------

努力作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	“光明日报”社論 (122)
-------------------	----------------

为谁而学·····	馮定 (124)
知識分子的个人主义思想改造問題·····	周建人 (131)
知識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 ·····	楊东蓀 (137)
清除知識分子前进中的绊脚石——自高自大 的个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民主傾向·····	茅以升 (146)
科学工作者必須虚心才能改造自己·····	貝时璋 (151)
科学家怎样爱国·····	王葆仁 (154)
科学家要不断学习馬列主义·····	裘維蕃 (158)

苏联科学的飞速进展証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	竺可楨 (161)
学习苏联知識分子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	邓初民 (170)
苏联科学家是我們最好的榜样·····	华罗庚 (174)

駁斥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綱領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會議上的发言)

郭沫若

各位代表！

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全面地总结了我們国家在过去一年来的偉大成就和丰富經驗，严正地駁斥了右派分子的种种荒謬言論，并在其中解答了科学界普遍关心的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我完全拥护周总理这个报告和其他各項报告。

現在請允許我就有关科学工作的問題作一点补充的說明。

我国的科学事业，解放以来逐步呈現出了繁榮的景象。广大科学家的精神是积极进取的，願意貢獻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偉大建設事业服务。去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科学家們更表現了参加社会主义建設的空前的积极性。有不少的人参加了发展科学的远景规划的制訂，并且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国科学院、高等教育部和国家其他部門以及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对于科学工作都給予了进一步的重視和支持，这就使得我国科学事业，在很短的时期內，获得了显著的发展。

在科学事业大踏步前进的途中，自然会出现許多問題和困难，需要人們去解决。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會議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报告，使科学家們获得了正确解决这些問題的犀利的思想武器。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的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和其他科学机关在四月間，接連召开了一系

列的、有許多科学家参加的座談会；五月下旬，中国科学院召开了学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六月中旬，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第四次扩大會議。在这些會議上，科学家們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問題，进行了热烈的討論，同时对科学工作也提出了大量的积极的批評和建議。这无疑对于克服缺点和改进工作是有极大好处的。

当然，不能設想，所有的批評意見都一律正确。事实上，在我們科学家中还存在着一些程度不同的錯誤的看法和想法。例如，我們認為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科学工作应当有計劃有领导地进行，进行科学研究应当根据国家建設的需要与个人專長和志趣相結合的方針，并应当以服从国家需要为原则。但有些科学家却認為科学工作可以不需要計劃和领导，科学研究可以不和国家的各項建設工作相結合，他們主張在科学究研上的絕對的个人自由，要为科学而科学。此类錯誤意見之所以产生，是有它的主观和客观的根源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工作的原則，对一部分科学家來說，还很习惯。一部分科学家对我国科学工作的实际情况也还不很了解，对于在工作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还不知道应当怎样采取正确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一些錯誤思想的产生，是不足为奇的。如大家所知，党和政府正在和科学家一道，采取正确有效的方法，来逐步解决最近一个时期出現的有关科学工作的一些思想問題和实际問題，以便把工作推向前进。

然而，資产階級右派分子，却乘机利用一部分科学家的錯誤思想，向党和政府大肆进攻，企图夺取科学工作的领导权，并且引导科学家离开社会主义的道路。在章伯鈞等人的主使下以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名义提出和发表了“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問題的几点意見”，就是資产階級右派分子这种惡毒企图的一个供狀。

这个意見書中提出了所謂“保护科学家”的口号。这显然是企图造成一种印象：我国科学家受到威胁，或者迫害，需要加以“保护”。事实上有人說过这样的话：“解放以来，中国知識分子遭了浩劫。”他們这样不顧事实危言聳听的目的，不外是想离間科学家同党和政府的关系，引誘他們走上錯誤的道路。

多数科学家，从亲身的经历中，已經发表了公正的意見。他們深深地感到，党和政府，是尊重、爱护和信任科学家的；党和政府也不断地在努力为科学家准备尽可能良好的工作条件。他們認為解放以来几年間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抵賽过以往年代的几十年、几百年。事实也正是这样。

以科学事业的經費为例，中国科学院的經費开支，以一九五零年为一百。一九五三年即达到一千零三十五。一九五六年更达到二千零六十二。绝对数值为六千六百七十四万元。而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九三六年，前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每年經費合起来不超过四百万元。高等学校的經費开支中專門用于科学研究的部分近年来也有很大增长，仅仅高等教育部分分配給各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經費，如以一九五五年为一百。一九五六年即為八百一十一。一九五七年更达到一千三百五十一。绝对数值为一千万元。

再以进口外国科学書刊的情况为例。一九五六年仅購買資本主义国家書刊所支出的外汇即为一百八十万英鎊，一九五七年略有縮减，但仍达到一百五十万英鎊。这个数字，比日本、印度、苏联进口的数字都大。以一个研究所为例：前北平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有圖書兩千余册，杂志三十四种；而現在新建的化学研究所即已經拥有圖書一万四千八百余册，杂志八百二十五种。

在这些数字面前，凡是正直的科学家，誰能够不承認党和政府在保障科学家的工作条件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呢？

自然，我們國家的建設事業十分繁重，人手既少，基礎不強，財力又並不充裕，在保障科學家工作條件方面，我們一時還不能做到事事令人滿意的地步。我們還有許多缺點、錯誤和努力不夠的地方，今後應當努力克服和改進。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把這一方面的工作是當做經常的重要任務來處理的，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在這方面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工作。這些情況，右派分子並不是不知道，但他們有意抹煞事實，裝出一付悲天憫人的樣子，大聲疾呼“保護科學家”，他們的用心不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的嗎？

民盟中央科學規劃臨時小組的意見書是一個徹頭徹尾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工作綱領。

在科學工作的組織和領導問題上，意見書中提出了同黨和政府的方針正相對立的主張。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工作要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意見書中對於這一點一字不提。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計劃的進行，要“重點發展，相應照顧”，意見書則主張不要計劃，不要重點，分散地、自發地進行。黨和政府的方針是，科學研究要有統一的學術領導，要有帶領整個科學工作前進的“火車頭”，意見書則主張不要統一的學術領導，不要“火車頭”。

科學研究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這是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基本特徵，也是我國科學工作區別於任何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工作的基本特徵，一切愛國的科學家是懂得這一點的，是願意這樣做的。右派分子卻企圖引導科學家離開國家建設的需要，其目的便是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國科學工作的社會主義性質。

為了適應國家建設的需要，我們必須從我國科學工作的現有基礎出發，有計劃有重點地適當集中、密切協作，迅速加以發展，使之徹底改變向來同國家建設需要不相適應的狀況，在

社会主义建設中發揮应有的作用。但是，意見書中却主張一切“研究工作”和“經費”都應該“就人”而安排，即是反对重点发展，反对必要的集中，反对发展新的部門和机构，主張那些服从国家需要改換了工作崗位的科学家回到“原来的研究环境”，即是反对科学家走上国家需要的新的重要崗位。他們之所以反对党和政府这些措施，主張分散进行、自由发展，實質上就是不希望科学工作改变它不能适应国家需要的老路，不希望科学工作为国家的建設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意見書中特別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的学术领导，反对科学工作中的“火車头”。大家知道，能够把全国的科学力量組織成为一个統一的队伍，發揮巨大的力量，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科学事业上的优越性的具体表现，是为資本主义制度下的任何国家所不能做到的。我国科学工作几年来的实践証明，要統率和指揮这样一个統一的科学队伍，就必须有一个統一的领导，有一个“火車头”。周恩来总理去年在关于知識分子問題的报告中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最近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四次扩大會議也重新肯定了这一点。右派分子認為这样规定的“火車头”是“主观的先行規定”。他們主張科学事业的各自为政，实际上就是要使科学工作陷于无政府状态。

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反对有計劃有重点地发展科学工作，反对对科学工作的統一领导，其結果就是要使我国不能充分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科学事业，就是要使我国科学工作長期停留在落后的状态。我相信，我国絕大多数科学家是絕對不能同意右派分子的这些倒行逆施的主張的。

在培养新生的科学力量的問題上，右派分子提出了一个所謂“人民内部在培养机会上应一視同仁”的号召，并且指責說：“过去在升学、升級、选拔研究生、留学生时，有片面强調政

治条件的偏向”。他們企图以資產階級虛偽的“平等”觀，在青年中進行挑撥和煽動，指望造成一部分青年對黨和政府不滿。

不錯，在高等學校招考新生的規定中，對於五種考生是要給予在成績與一般考生相等時優先錄取的待遇的。這五種人是：（1）少數民族學生；（2）華僑學生和港澳學生；（3）工人、農民，工農速成中學本年畢業生，工農幹部；（4）復員建設軍人和轉業軍人；（5）革命烈士的子女。

這樣的待遇是不是右派分子所說的不“一視同仁”或者不平等呢？當然不是。先說工農學生吧。大家知道舊中國在反動統治之下，工農子女被剝奪了受教育，特別是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現在，反動統治已經推翻了，對於這個不合理的不平等的狀況，難道我們不應該盡最大力量來加以改變嗎？應當指出，在這一方面，我們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完全消除舊社會留下來的不平等現象。為了說明這一點我要舉出這樣幾個百分比。

高等學校一九五六年九月在校學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4.29%，同一期間在校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17.46%。中國科學院現在在學的研究生中，工農成分只占5.92%。據1952—1956年留蘇預備班資料，留蘇學生中工農成分只占30.1%。這些數字，告訴了我們：現在受國家培養的青年科學幹部，工農成分只占少數，而資產階級、地主家庭出身的青年，則仍然占多數。在這種情況下，右派分子還提出所謂“一視同仁”的口號，他的欺騙和挑撥性質不是十分明顯嗎？

對於少數民族學生，他們同樣是在反動統治下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權利的，對於回國求學的華僑和港澳學生，對於為革命犧牲了的烈士子女，要給以必要的照顧，這是千應該、萬應該的事，我這裡不準備多說。

右派分子還有一種挑撥性的說法，據說在培養青年科學幹部上共產黨員和共青团員享有“特權”。這也是所謂“一視同仁”

的口號的一個思想背景。這事實上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露骨的表现。他們娓娓一點說，便是“片面強調政治條件”。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不能讓步的。在選拔青年科學幹部上，政治標準必須堅持，這是一點也不能動搖的。國家所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建設人才。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如果符合選拔的標準，包括政治的和業務的標準，就應當多多選拔。共產黨員多，共青團員多，這在我們看來正是好事，而在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看來却是坏事。右派分子之所以極盡其排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之能事，是他們的階級本質所決定的。排斥工农、排斥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其目的就在於改變我國科學技術後備隊伍的階級成分和政治質量。右派分子是在企圖偷天換日。

自然，對於非工农出身的，非黨非團的青年，黨和政府同樣是十分愛護和盡力培養的，決沒有也不會對他們採取歧視和排斥的態度，以中國科學院現在在學的研究生為例，其中地主、資產階級家庭出身的即占41.4%，非黨非團的即占37.9%。思想是可以改造的。一切非工农出身的和非黨非團的學生，只要自己願意，都能把自己培養成為忠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專家，同工农子弟和黨團員一樣為國家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社會科學方面，意見書提出了“首先改變對待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態度”和“恢復”資產階級社會科學的意見。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實際上就是說，我們首先要去發展資產階級的社會科學，而不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這個意見是能夠接受的嗎？

社會科學有鮮明的階級性。資產階級的所謂社會科學，是資產階級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反映，是為資產階級的利益服務的。資產階級雖然很早以來建立了“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等形形色色的所謂社會科學，但是資產階級由於歷史的局限性，從他們狹隘的階級利益出發，不可能真正科學地

闡明社会历史发展的規律，解决种种复杂的社会現象。因此，从根本上来說，所謂資產階級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人类历史和社会現象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是到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手里才开始。馬克思和恩格斯實現了社会科学上的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反資產階級学者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把社会經濟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出生产关系来，并把它当作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关系。这才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

解放以来，我国社会科学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队伍，比解放以前扩大得多了。这是因为在革命胜利以后，經歷了几次偉大的社会改革运动，特别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和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运动，在我們的社会科学家中，有許多人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資產階級思想观点，接受了馬克思主义，而同时大批年青的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又从各方面成長了起来，因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获得了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当然，我国当前社会科学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建設的需要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最根本的弱点是，我們的社会科学队伍中，能够真正創造性地运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學問的人还是太少。在对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中，我們表現出不够有力。因此，在我看来，今后为了发展社会科学，首先的任务就在于繼續扩大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的队伍，提高馬克思主义的水平，而不是什么发展資產階級社会科学。那种“恢复”資產階級社会科学的主張，实际上是开倒車，反对用馬克思主义来研究社会科学。如果按照这个主張去做，其结果是削弱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而使資產階級唯心主义思想重新泛濫。当然，这是違反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的願望的，也是違反建設社会主义道路的。

意見書中还有这么一种論調，說“有人”認為“社会主义社

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沒有可繼承的”。这是毫无根据的謠言。馬克思主义者一向主張繼承一切有益的文化遺產，这在毛澤东主席的許多重要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許多重要文件中，都有非常明确的指示。事实上大多数的社会科学家都是十分尊重文化遺產的。只有那些被称为“穴居野人”的虛无主义者才主張拒絕一切文化遺產。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历史上一切知識的总结。只要讀过列宁的“馬克思主义底三个来源和三个組成部分”这一著名論文的人，誰都会十分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謂“从头創造”的說法，不过是右派分子的一枝暗箭罢了。

当然，在文化遺產問題上，我們和某些人之間，是存在着原則上的分歧的。有一些人把資產階級的文化遺產奉为神圣，主張全盘接受，或者簡單地予以“恢复”，我們則采取批判的态度，謹慎地吸收其中积极的、有益的成分。要批判地接受文化遺產，必須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須有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离开了馬克思主义，我們就会失去批判的能力，就无法接受有益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們要明白地指出：右派分子是和我們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場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民盟中央科学规划临时小組的“几点意見”，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科学工作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資產階級綱領。这不是一个孤立的文件，而是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企图夺取国家領導权，首先是文教工作的領導权的阴谋的一部分。章伯鈞等右派分子为了夺取文教工作的領導权，在民盟成立的四个临时工作組中，首先加紧“科学规划組”和“高等学校党委制組”的活动。光明日报在发表“几点意見”的同时，还发表了短評，認為这是“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真是好一个向資本主义复辟的所謂“新路”！看来，这个“几点意見”实际上就是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所“設計”出来的第一批貨色了。

现在这个阴谋已經揭穿，真象已經大白，右派分子指望在

科学家中爭取大量群众的幻想已經完全破灭了。事实証明，右派分子必然是标准的主观主义者。他們对于自己作了过高的估計，对于群众作了过低的估計。这就使得他們的一切不得不宣告完全破产。

中国科学家絕大部分是爱国的，是願意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为資产階級右派分子所利用、所驅使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就是这少数叫嚷“保护科学家”的人，我們認為他們倒應該有必要自行保护。他們應該赶快清醒起来，彻底清算自己的思想，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同絕大多数的科学家們站在一道，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我在这里想代表中国科学家們說一句話，也可以說等于宣誓，我相信科学家們是会同意的。我們中国科学家要長远地坚持自願自覺的思想改造，在对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中，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更加紧密地團結在党和政府的周圍，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繼續前进。

（1957年7月5日）

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的兩条道路

于光远

在如何发展我国科学事业上，右派分子与我們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个根本的分歧就是聶荣臻同志在7月17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專門学会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的講話中所指出的，資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現在我想專从自然科学方面发表一些个人意見。

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在发展科学事业中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就是科学事业要有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明确目标。为此，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时要根据国家建設需要和个人專長相結合，理論和实际相結合的原則。而走資本主义道路則与此相反，就是否認科学專業必須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設服务的原則，提倡为科学而科学，主張科学家可以不顧国家需要單从个人成就、个人兴趣出发来进行研究工作。

科学总是为一定的社会生产，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这是科学作为一种社会現象，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能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不但社会科学有强烈的阶级性，必然服务于一定阶级的利益，就是本身沒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同样为一定的社会生产服务，为掌握那个社会的生产的統治阶级服务。

在資本主义国家中，不少科学家看不到这一点的。他們把进行研究本身說成就是他們工作的目的。認為他們的工作不受

任何“功利”的影响。其实在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研究机构和研究基金组织，他们总是根据能否为自己带来更大的利润的考虑，根据资产阶级国家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支持或反对这一项或那一项研究工作，从而在实际上影响着、指挥着整个科学界的活动。

社会主义国家中，科学是为全体劳动人民造福的，在这里，科学家象工人、农民一样，通过研究工作这种劳动来履行他对国家、对人民应负的责任。他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人民。与资本主义的科学事业不同，社会主义科学事业公开强调它为国家建设服务的目的性，强调科学家应该自觉地为社会建设服务。

几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科学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并用这个原则来教育科学家。我国大多数科学家也已经懂得这个原则，通过几年来自己的工作实践，他们认识到这个原则的正确。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完全相反，他们既然仇视社会主义；当然反对科学工作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力图引诱我国科学家离开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

被郭沫若院长斥为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民盟中央的文件，露骨地表明了右派分子如何反对科学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这个文件中不但对科学工作服务于国家建设的需要一字不提，而且还要求那些已经服从国家建设需要，走上新的重要的工作岗位的科学家，不去克服工作条件方面的暂时困难，回到“原来的研究环境”。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中把“研究工作去‘就人’”作为组织我国科学工作的主要原则，更是用来反对按照国家建设需要对现有科学力量加以调整的。

对现有科学力量进行适当调整的必要时，主要有下面几方面的理由。首先，旧中国的科学事业不但基础薄弱，而且已有的研究机构和研究力量的分布也是不合理的。为了充分发挥科学

家的力量，充分利用研究工作的設備，必須使研究機構尽可能接近研究對象。其次，目前我國正在迅速建立國家所急需的，空白的或薄弱的一些學科。這些學科一般需要複雜巨大的實驗設備，它的研究工作的實驗部分（甚至某些理論部分）不是少數科學家單獨所能進行的，要求科學家集體緊密配合地進行工作。為此，必須集中一批科學家，甚至要求一些科學家在接近原來專長的範圍內“改行”，轉來從事國家所急需的研究工作。同時，為了支援新建的工業地區和某些少數民族地區的科学文化建設，也需要在這些地區建立新的高等學校和新的科學研究機構，需要一些科學家“離開原來的研究環境”，到這些地方去工作。在初到新的研究環境時，研究工作暫時可能受到一些影響，但是從長遠看來，這對我國科學事業的發展好處是更大的。右派分子反對對現有科學力量的必要的調整就是想拉我們科學家的後腿，想打亂黨和國家對科學力量的部署，使我國科學工作無法去適應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

右派還極力去宣揚資產階級“為科學而科學”的錯誤觀點。說什麼“強調服務於國家需要就是功利主義，功利主義就一定會妨礙科學的發展”，故意把服從國家需要和科學發展本身的利益對立起來，阻止科學家們去為勞動人民立功，為社會主義國家謀利。所謂“強調服務於生產需要，就會妨礙科學發展”的論調與科學發展的事實也是完全不符的。社會主義國家科學發展的事實我們姑且不說，就拿近代科學與十七八世紀的科學作一個比較，近代科學與社會生活各方面實際的聯繫，比之十七八世紀要密切得多，要“功利主義”得多。但是，近代科學的發展，比十七八世紀不知快多少。

要有計劃、要有組織

科學事業要能有成效地服務於社會主義建設，一定要有計